

# 人口流动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综述

罗运霞 范乔希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

**摘要：**为了能够更好的了解人口流动对经济增长带来的影响，更好的推动经济发展。文章通过梳理国内外人口流动理论发展与人口流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相关文献，发现人口流动对经济增长是否具有促进作用学界尚未得出一致结论，我国学者缺乏对西部地区基于地级市层面数据的相关研究，学者多以人力资本水平作为中间变量进行研究。在未来的研究之中还需要加强对西部地区基于地级市层面数据的相关研究。

**关键词：**人口流动；经济增长；人口流动理论

【DOI】10.12252/j.issn.2096-627X.2023.09.107

##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口流动急剧加速，人口作为推动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快速的人口流动会改变一个地区的人口数量、结构等从而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

## 一、国外研究综述

### 1. 人口流动理论

国外关于人口流动的研究历史悠久，最早可追溯至十五世纪中后期，然而人口流动理论的正式形成却在约四百年后的1885年。英国统计学家莱文斯坦（E. G. Ravenstein, 1885）的论文《人口迁移规律》发表标志着人口流动理论正式形成，其认为经济发展产生的吸引力对人口迁移至关重要<sup>[1]</sup>。赫博尔（R. Heberle, 1938）认为人口流动不是单一因素造成的，其将一系列因素归纳为使人口流出原居住地的“推力”和促进人口迁入新居地的“拉力”。该研究进一步丰富了“推-拉”理论。李（E. S. Lee, 1966）在前人的基础上，将“推-拉”理论进一步拓展，认为：迁移不仅取决于出发地和目的地的差异性，也受到迁移途中的障碍制约。这些障碍包括物理距离、迁移成本、心理障碍等。迁移障碍越大，实际的人口迁移规模也会降低<sup>[2]</sup>。

刘易斯（W. A. Lewis, 1954）提出二元经济模型，认为发展中国家同时存在传统农业部门与现代工业部门，且后者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农村土地生产效率的提高为现代化工业部门提供大量剩余劳动力，使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20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托罗达（M. P. Todaro, 1969）针对刘易斯模型的局限，设计了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的决策模型。该模型认为，农村劳动力是基于对城市预期收入的估计而做出迁移决策，而非仅仅依据城乡实际收入差异。模型预测，如果城市就业机会有限，过多的外来劳动力会导致失业问题加剧。因此，适度控制人口流动有其必要性<sup>[3]</sup>。

美国经济学家拉斯塔（L. A. Sjaastad, 1962）基于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从投资收益的角度定量分析了劳动力迁移的经济学原因，认为只有当迁移带来的收益高于迁移成本时，个体才会进行迁移<sup>[4]</sup>。

新经济移民理论则强调迁移决策应作为一个家庭集体行为来考虑。代表学者斯塔克（O. Stark, 1984）指出，家庭成员的迁移与否取决于是否能给家庭带来最大收益和最小风险<sup>[5]</sup>。迪科等（Dicko, 2013）研究发现自然环境、人际关系和就业机会对人口流动有很大影响。

### 2. 人口流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国外学者在人口流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方面研究成果较为丰富。马尔萨斯的适度人口理论认为人口数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呈倒“U”型。凯恩斯也曾在研究中指出与人口数量减少相比，人口过度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更严重，他认为人口流动会影响有效需求和投资，从而影响经济增长。法国人口学家索维在研究中吸收了马尔萨斯的理论成果，并考虑到技术进步等条件的变迁，提出了“经济适度人口”的概念。他认为，适当的人口规模可以有效利用土地资源，从而推动经济的高速增长。赫茨勒、麦多斯、埃里奇等学者也从不同角度验证了人口集聚对经济增长既有促进作用也有抑制作用。西科内（A. Ciccone, 2002）利用欧洲600多个地区的统计数据，通过实证研究检验了人口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祖巴列维奇（N. V. Zubarevich, 2018）则通过研究前苏联11个国家的首都人口和经济集中态势，发现多数国家存在显著的人口和经济向首都集聚的趋势，劳动力向首都地区流动，推动了这些地区的经济增长<sup>[6]</sup>。布罗尔斯马（L. Broersma, 2010）使用荷兰40个地区1993-2002年的面板数据进行研究，发现人口过度拥挤会降低多要素生产率，从而抑制经济增长，实证支持了人口密度增加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马尔乔里等（L. Marchiori, 2012）通过研究发现非洲干旱

等极端天气导致跨区域人口大规模流动,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sup>[7]</sup>。

部分学者认为人口流动会扩大地区经济差距。威廉姆森(J. G. Williamson, 1965)通过对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区域不平衡的规律进行分析,发现人口流动加剧了区域间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劳赫(J. E. Rauc, 1993)熟练劳动力向大城市集聚,导致城市间及区域间生产率差异拉大。坎布尔和维纳布尔斯(R. Kanbur & A. J. Venables, 2005)研究发现发展中国家区域差距持续扩大与产业集聚和人口流动相关。但也有学者认为人口流动会缩小地区经济差距。巴罗和萨拉马丁(R. J. Barro & X. Sala-i-Martin, 1991)通过分析年美国各州人均收入在1880-1988年间的收敛情况,发现人口从落后州向发达州的流动,推动了不同州间收入水平的收敛<sup>[8]</sup>。拉帕波特(J. Rappaport, 2007)认为由气候变化引起的人口流动有利于缩小美国南、西部地区与东北等地区的经济差距。

## 二、国内研究综述

### 1. 人口流动理论

我国对人口迁移研究起步较晚,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改革开放前,计划经济和户籍限制严格控制了人口流动,相关研究也相对较少。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条件下,人口迁移现象日趋活跃,学界开始了大量研究,在借鉴国外理论基础,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取得了拓展性成果。

我国人口迁移研究初期,胡焕庸等人(1984)论述了中国的人口现状和人口迁移的时空变化等<sup>[9]</sup>。林友苏(1987)指出人口流动会改变区域人口规模和密度,进而影响劳动力市场<sup>[10]</sup>。李骏阳(1988)在分析刘易斯经济发展模型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实际探讨了当时人口流动现状。田方、张东亮(1989)较系统地归纳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至1980年代中国人口的主要迁移活动<sup>[11]</sup>。郭熙保(1989)指出,人口从农村向城市流动是发展中国家社会进步的必然现象。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在借鉴西方理论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实际,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辜胜阻、简新华(1994)通过推拉力模型分析发现,中国农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对农民外出流动的推力较小,农民迁移更多是被外界吸引。王桂新(1996)采用空间模型指出,经济规模是影响省际人口流入流出的主要因素<sup>[12]</sup>。陈吉元(1996)认为收入差异是导致大量农民进城的原因。白光润、朱海森(1999)则提出收入水平和生活环境差异是人口迁移的动因<sup>[13]</sup>。

20世纪50年代我国开始建立起来的城乡二元经济模式,必然导致不同地区之间的人口迁移流动。我国学者在刘易斯模型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国情进行了理论延伸和应用。蔡昉(1995)分析认为,中国长期实行的二元经济结构与城乡收入差距,是促使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的重要因素<sup>[14]</sup>。朱先奇(1998)通过模型比较指出,在城乡收入差距存在时,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是经济发展的必然,应顺应这一趋势提升人力资源配置。

随着全国人口普查的开展,学者们对人口流动的研究更深入,在理论研究方面有了更深入的突破。段成荣(2000)研究发现:年龄、性别和婚姻状况等个人特征对决定个人迁移行为具有显著影响。石智雷、杨云彦(2012)认为家庭禀赋对农民工个人能力以及回流农村后的创业有显著影响,且回流劳动力与没有外出务工经历的人相比,能够更好的利用家庭禀赋<sup>[15]</sup>。盛广耀(2018)构建复杂的人口流动网络,发现社会关系网、收入水平、经济发展水平等都会影响人口流动。

### 2. 人口流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我国学者基于前人对人口流动的理论研究,在人口流动对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上硕果累累,就研究结论而言主要分为三种:

大多学者认为人口流动会促进经济增长。董栓成(2004)运用灰色系统理论进行实证分析,发现我国区域间人口流动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优于区域内人口流动<sup>[16]</sup>。苏伟洲等(2017)运用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和卢卡斯的内生增长模型以我国31省(市)域为研究对象,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沈映春等(2019)运用新古典经济模型的变形研究京津冀地区人口流动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发现人口流动会促进京津冀区域的经济增长,但过于活跃的人口流动状态不利于该区域经济增速的稳定和提升<sup>[17]</sup>。史桂芬等(2020)研究发现人口流动促进长三角城市群经济增长,且人口流动通过影响产业结构、科技创新和居民消费三条路径来促进经济增长。严驰昊等(2023)运用非参数统计等多种方法也证实了人口流动会促进经济增长。也有学者认为人口流动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存在地域差异,孙继国等(2021)基于2006-2017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运用新古典经济模型进行研究,发现在全国层面人口流动不能明显促进区域经济发展。但在西部地区人口流动对经济增长存在正面影响,在中东部地区存在负面影响,且人口流动是通过影响工资水平进而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sup>[18]</sup>。

部分学者认为人口流动会抑制经济增长。李晓阳等

(2015)利用2000-2013年重庆市五大功能区数据研究发现人口流动显著抑制经济增长。易莹莹等(2015)利用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拓展模型研究也发现劳动力流入对重庆经济增长存明显负效应。周少甫和陈哲(2020)运用动态空间模型进行研究,发现人口流动对全国及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均呈现负效应<sup>[19]</sup>。柳如眉等(2021)对东北地区的研究也得出同样结论。

此外,部分学者将人口流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分为对流入地和流出地进行研究,发现人口流动会促进流入地经济增长,抑制流出地经济增长。俞会新等(2021)基于省级面数据研究发现人口流动会促进净流入地的经济增长,对净流出地的经济增长呈现出显著的负面影响。何雄浪等(2021)研究也有同样结论,且对流入地的促进作用明显强于对流出地的负面作用<sup>[20]</sup>。

### 三、研究评述

通过对上述文献的梳理,可以发现关于人口流动理论和人口流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两方面的研究成果都较为丰富。传统人口流动理论更侧重于外部因素的研究,而较少关注个人因素及其社会适应能力等问题。直到新时期跨学科综合研究的兴起,西方学者才开始从社会学、经济学等多学科视角全面审视人口流动问题,并将研究成果模型化和计量化,在计算机技术的支持下取得了长足发展,对传统理论形成了很好的补充。大多学者认为人口流动会促进经济增长,但国内外均有学者通过实证研究反驳该观点,说明学界对此尚无一致观点,人口流动是否促进经济增长有待进一步研究。现有我国人口流动对经济增长的研究大多基于省级层面,对地级市的细化研究较少,且对西部地区人口流动的研究也较为缺乏,而已有文献基于省级数据对人口流动在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效应研究结论存在矛盾。此外,现有研究在实证分析过程中多以人力资本水平作为人口流动对经济增长的中间变量,较少有学者考虑以消费规模作为中间变量来开展研究。

### 参考文献

[1] Ravenstein E G. The Laws of Migration, Part I[J]. Journal of the Statistical Society of London, 1885, 48 (2): 167-235.  
 [2] Lee E S. A theory of migration[J]. Demography, 1966, 3 (1): 47-57.  
 [3] Todaro M P. A model of labor migration and urban unemployment in less developed countries[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69,

59 (1): 138-148.

[4] Tarkenton O, Bloom D E. The new economics of labor migration[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85, 75 (2): 173-178.

[5] Zubarevich N V. Agglomeration effects in post-Soviet countries[J]. Regional Research of Russia, 2018, 8 (1): 1-12.

[6] Marchiori L, Maystadt J F, Schumacher I. The impact of weather anomalies on migration in sub-Saharan Africa[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2012, 63 (3): 355-374.

[7] Barro R J, Sala-i-Martin X. Convergence across states and regions[J].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1991, 00 (1): 107-182.

[8] 胡焕庸, 张善余. 中国人口地理[J].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4, 17 (6): 256.

[9] 田方, 张东亮. 中国人口迁移新探[J]. 知识出版社, 1989, 00 (5): 3.

[10] 王桂新. 中国人口迁移与区域经济发展关系之分析[J]. 人口研究, 1996, 0 (6): 9-16.

[11] 白光润, 朱海森. 中国大陆人口移动机制与调控对策[J]. 人文地理, 1999, 14 (3): 46-50.

[12] 蔡昉. 人口迁移和流动的成因、趋势与政策[J]. 中国人口科学, 1995, 0 (6): 8-16.

[13] 石智雷, 杨云彦. 家庭禀赋、农民工回流与创业参与——来自湖北恩施州的经验证据[J]. 经济管理, 2012, 34 (03): 151-162.

[14] 董栓成. 人口流动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实证分析[J]. 市场与人口分析, 2004, 9 (05): 23-26.

[15] 沈映春, 王逸琪. 京津冀人口流动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与政策建议[J]. 经济纵横, 2019, 00 (05): 94-101.

[16] 孙继国, 石铁华, 许清清. 人口流动、工资变化与经济增长——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空间计量分析[J]. 人口与发展, 2021, 27 (04): 14-23.

[17] 周少甫, 陈哲. 人口流动对中国经济增长收敛性影响——基于空间溢出角度的研究[J]. 云南财经大学学报, 2020, 36 (02): 49-59.

[18] 何雄浪, 史世姣. 人口流动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基于中国地级市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J]. 金融与经济, 2021, 9 (03): 63-70.